



新开端：

加拿大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70)

A NEW BEGINNING: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NEW BEGINNING: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拿大]
包义文 / 编
傅尧乐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天津师大加拿大



204934786

A NEW BEGINNING: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开端:

加拿大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70)

[加拿大]

包义文 / 编
傅尧乐



K711.52

4934786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本书根据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出版的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1970, by *P · M · Evans and B · M · Frolic* 译出,
并已获得原书出版社的授权。

新开端：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

[加拿大] 包义文 傅尧乐 编

天津师大加研中心 译

李节传 校 责任编辑 朱崇平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郑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625 字数 267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5—03433—X/K · 518 定价： 12. 00 元

内容简介

《新开端：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加拿大政府拒不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政府。在此后的20余年里，加拿大对华政策是以台湾的国民党为中心，而对这个人民共和国则是稍加注意，然而，这个人民共和国尽管外界知之甚少，却是强大得很，国民党要在它的笼罩下为生存而挣扎。

包义文和傅尧乐在这个论文集里选编了10篇论文，论述了加拿大从1949年到1971年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对大陆的关系。这些论文都很有创见。包义文写的导言概括介绍了本书的内容；第一组文章探讨的是特殊政策的内容，诸如加拿大与联合国在这些年里承认中国这样的敏感问题；第二组文章讨论了莱斯特·皮尔逊、皮埃尔·特鲁多、阿尔文·汉密尔顿等人的作用；最后一组3篇文章分别勾画了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承认对华裔加拿大人一个社区以及对国民党的影响。

所有这些论文对与这个国家建立正式联系的复杂过程及其在国内外的意义，都做了具有洞察力的分析。

包义文和傅尧乐是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说 明

这里我们要对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编者的研究及蒙特贝罗会议，谨表谢忱。此外，外交部也为会议提供了资助，并且为方便阅读外交部文献档案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我们特别赞赏亚瑟·布兰切特和达柯莱·柯尔的工作。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委托的两位不知名读者的评论，使本书受益匪浅；亚瑟·孟席斯对初稿的评论，也使我们收获甚多。我们特别感谢徐枫在中译本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当然，编者与作者应对书中的观点及提供的事实负责。

为纪念外交家和学者约翰·温德
尔·霍尔姆斯 (1910—1988) 而编，本
书无处不体现他的见地。

本书由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处资助出版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乐意介绍这部极为重要的加中关系史著作——《新开端》。这是中文本第一版。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部著作终于能和中国读者见面了。当加中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更充满活力的阶段，让每个人都了解最近几十年来逐步奠定起来的加中关系的重要基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这块基石使当今和谐而富有成效的交流成为可能。

这部著作收入的文章，首次试图论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0年加中正式建交期间的加拿大对华政策。第一篇文章讲述传教关系，对近几十年来制定对华政策的动机与影响因素作了初步分析。我个人认为这个文集的最大特点是：不仅把各种不同的看法归结在一起，还相当准确地追踪像切斯特·朗宁、阿尔文·汉密尔顿、皮埃尔·特鲁多这些加拿大著名人物在中国这个舞台上的表演，以及加中外交承认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政治障碍。

对我们这些近几年来在华任外交官的人来说，最高兴的是看到“承认”难题一旦解决，我们的关系才可能蓬勃发展这一事实。从那一时刻起，文化、学术、移民、发展合作以及贸易与政治的所有领域的交往，都不断发展起来，几乎一夜之间，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仅是几个献身者

的个人事业，而成为一个更大众化的事业。人民对人民，社区对社区，商界对商界的交流都建立起来了。

本书只是偶尔提到诺尔曼·白求恩。但是，中国读者将会第一次看到把中国和加拿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许多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毫无疑问，在这些人物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切斯特·朗宁，一个事实上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事业的人。甚至当他在其它国家工作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中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步入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60年代，加拿大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为替加拿大剩余小麦寻找市场而卷入了中国事务，主要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这个保守党人发现自己和社会主义分子朗宁一样宣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广泛接触的必要性。但是，正是自由党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快刀斩乱麻，解决了承认的难题。他于1949年和1960年两度访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革命中国的潜在能力和不承认它的荒谬性。甚至当中国的各项政策得不到西方绝大多数国家赞同的时候，特鲁多就极力主张西方应当允许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他写道：“使中国走出孤立符合世界的利益。”两年以后当选为总理时，他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意愿。他这样做不仅为加拿大人在亚洲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也为西方以及不结盟国家步加拿大后尘与新中国建交确定了方向。

这部著作事实上截止于加中关系开始进入现代的时候，所以，它只是预见而没有分析自那以后的发展。人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将会给经济与商务关系留些地盘，用一些篇幅来写加拿大主要的工业企业在近几年为帮助中国发展基本设施所发挥的作用，应写上阿尔伯塔省与中国东北在石油天然气工

业领域所确立的极有成效的关系；还应写上由北方电讯公司和其它几个加拿大水力发电公司财团在解决中国通讯与电力需求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联系越强，越多样化，加拿大人在中国就越会有更多更广泛的活动领域。

的确，1989年6月事件以前加中之间的天空是一片晴朗，但自那以后，加拿大人开始意识到未来的关系也得把经济以外的进展考虑进去。未来的一部著作无疑要分析自那时开始的新的“政治”关系，相应地，也要探讨这一政治关系又是怎样引导出一个更成熟、更现实处理双边关系的方法；它还将追踪我们合作政策的进展，以及描述旨在向中国各类机构提供更多新方法以妥善处理由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改革问题；同样，人们可以考察学术交流之外的其它重要领域，诸如法制建设、民主发展、法规基础和税收的公平公道等。加中律师和律师协会之间的专业联络正在形成，这将是更加复杂的互利关系网络中的另一新环节。这些新型的交流也包括技术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还有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交往。这些交流与我们的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同时进展，可以称之为加拿大重新发现中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以1994年一系列高层访问为开端，而1994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阁下的访问将使其达到高峰。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加中关系正向强劲而日益成熟的方向发展。目前看上去没有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但未来必然是多事的。两国在保持相互友好和经济互补关系的同时，未来越进一步交往，也越容易对对方的循环过程产生敏感。对加拿大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克服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不断出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要求他们对北美繁荣

与萧条的交替过程有进一步的了解，一方面在萧条时期我们的商界人士认为要紧缩投资，而在北美繁荣时期我们却又会专心致力于广阔的北美市场。政治发展的结果甚至更难预料，中国当前迅速发展的社会改革，必然要在国家体制内部，实际也会在民众中造成摩擦。所有这些都将会对加拿大人如何看中国以及他们要与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发生重大影响。虽然加拿大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也许不像中国政治动荡使加拿大人担忧令我们中国伙伴烦乱，但是，却会使加拿大决策者茫然无措。人们也无法预言当前亚洲战略的调整对我们的交流进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不管出现什么挑战，最好是冷静处理，同时，只要加拿大人和中国人能经常一起奋斗，就能战胜挑战。

加拿大驻华大使 碧福* 贺新 译

1994年6月22日于中国北京

* 本书正式出版时，碧福先生已谢任回国。

译者的话： 关于中加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开端》一书能在中国出版，首先应归功于加拿大政府的帮助，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通过驻华使馆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资助。同时，我们还应深致感谢加拿大现任驻华大使碧福（Fred Bild）先生，尽管他外事公务繁忙，却抽出时间为《新开端》中文版行文作序，足见他十分重视让人们了解中加友谊的历史，十分关心中加文化交流，也表明加拿大政府积极支持中国学者的加拿大研究。我们殊感荣幸。大使的序文会使本书增辉，在中国广为流传。重要的是大使写到了中加关系的新进展，并预测了未来，还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希望。这些对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都是十分有益的。

《新开端》能够在中国出版还应感谢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以前的两位文化参赞许美德女士（Ruth Hayhoe）、伯顿（Charles Burton）先生，以及现任文化参赞王仁强（Richard King）博士。他们对本书在中国出版发行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支持。在这方面，文化处高级官员陆世伟（Mark Rowswell，中国朋友通常亲切称呼他“大山”）先生

也应受到同样的称赞。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文化处官员傅信远女士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际帮助。此外，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刘广太先生以及天津师大历史系庞玉洁女士在去年赴加期间联系和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刘广太先生还为本书翻译提出许多可贵的见解。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杨生茂教授对某些疑点的翻译给予了指导。天津师大副校长高悌先生和科研处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做了有益的事情。贺新女士还请我国外交部有关机构帮助我们核对了某些资料。此外，卡尔顿大学历史系休谟（Norman Hillmer）和国际加研会（ICCS）的琳达（Linda M. Jones）小姐也帮助处理了一些疑难问题。在此，对这个群体的贡献表示衷心谢忱，感谢以上所有这些先生、女士对我们为促进中加两国人民进一步了解而做的这项有益工作所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承担本书中文版出版任务。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多为外语专业的教师，他们的中外文水平都可信赖，但从专业角度的理解深度则参差不齐，因而全部译稿均由笔者校对，有的章节还重译。笔者认为本书涉及两国外交关系，译文应尽可能准确地传达作者原意，所以在校对过程中特别注重信达，力求准确，通顺流畅。同时，还注意尽可能地保留原译者的文体风韵。为使理解万无一失，全部译稿粗校一遍后又交加拿大约克大学两位主编审查了一遍，作了些修改，大部分被采纳。其后，笔者又将译稿仔细复校一遍。因此，中文版最后可能出现的理解问题，均应由本人负责。书中脚注是本人所加，大部分注释以及索引也为本人所译。

1991年笔者在多伦多大学时，得知约克大学包义文和

傅尧乐两教授正出版一部加中关系的编著。由于正研究该领域的一个题目，所以，对这部即将问世的著作一直很关心。先是听说5月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推迟到9月，但我已预定8月初回国，很遗憾未能先睹为快。好在1992年6月包义文教授通过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处寄赠一本。离开多伦多的前一天，在多大历史系见到包义文时，表示有兴趣将他们这部大作译成中文出版。这位教授表示，中国国内还有其它几个学校也有此意，建议我回到北京后访问文化处，商量此事。回国不久，我即通过周平洁女士向前任参赞伯顿先生正式提起此事。不久，周女士告诉我：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计划翻译此书。我表示，有人译就好，我们就不必译了。但是，周女士建议我等到1992年8月呼和浩特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视情况后再作定夺。会后始知，两校并未翻译，而我手头又现成有书，所以，从呼和浩特回来后，便正式请求文化处帮助联系作者转让版权以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此次，文化处的傅信远女士、陆世伟以及伯顿参赞本人，立即给与亲切的关怀。

我们着手翻译时，我国刚刚加入国际版权组织。虽然当时对版权还要求不太严格，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件为促进中加文化交流十分严肃的事业，涉及的著作恰好又是有关加中关系的曲折历史，一定要认真对待，所以坚持再困难也要按正规途径办理版权转让手续。由于我国当时办理版权业务尚未走入正轨，我们又是首次接触此事，无经验，再加上一些不必要的人为因素，耽搁了将近两年，1994年3月底才正式办妥。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Charley LaRose小姐在版权转让上的理解与配合。这样，在中加两

国迄今为止首部综合论述冷战时代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著作终于要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中加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好事，有助于中国人民加深对加拿大政府与人民的了解。

《新开端》一书原题为《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94年9月中旬，包义文和傅尧乐两教授致函译者，建议改为现名：'A New Beginning: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下面着重就书中所涉及到的某些重要问题，提出几点浅薄看法，以求教于编者与读者。

—

《新开端》严格地说论述的不是中加关系的历史，而是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思考及惰于行成的原因。本书断限，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下至1970年10月中加相互承认与建交之时。这21年基本上是中加关系的空白时期，两国相互隔绝，无关系可言，既无正式外交关系，也无全面的经贸交流与民间往来。其间值得一提的所谓交往，是60年代初中国处于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开始的中加粮食贸易，加拿大卖小麦给中国。

实际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加拿大政府即已作出承认与建交的正确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特鲁多政府1968年登台之前的几届政府，无论保守党的还是自由党的，都没有将其付诸实施。傅尧乐和包义文教授编著这

部书，从各个方面，以不同专业角度，紧紧围绕承认以及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这两大关键问题，探讨加拿大几届政府拖延解决的种种原因与障碍。至于第一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代里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编者也是将其作为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思考方方面面的背景之一来考察的。

加拿大学术界在中加建交以前已经开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那时的讨论大都归咎于加拿大政府过分听命于美国政府。而《新开端》的编者试图为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作个总结，就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思考失误的根源进行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考察。编者似乎认为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有失偏颇，那时，许多人一说到对华政策的失误，便“把目光转向华盛顿而不是太平洋彼岸”，“对华政策象征渥太华过分依赖于华盛顿而使加拿大的形象受到损害”。编者还认为加拿大政策失误的原因“十分复杂，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美国的干扰”，除美国“行动与态度”的影响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加拿大在远东与中国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加拿大在远东和亚洲缺少战略利益而采取消极政策；战后对外交目标与战略安排存在分歧等等。同时还有内部的制约因素，加拿大人的中国观具有“多样性”特点，致使中加关系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多变和大起大落，而是进展平稳。此外，中国方面缺乏积极性，有时，还受中国政治变动的影响，等等。从本书导言、文章编排顺序，以及重点文章（二、三、四章）的基本倾向，我们明显可以看出编者但求客观的良苦用心。二三两章围绕承认与联合国代表权这两大主题，旨在从美国影响因素之外发掘其它干扰因素；而第四章可以视为作者维护

了传统看法，以美国的材料来源，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的反华政策对加拿大的限制作用，但文章结尾处也加上了别种因素的补充。不过，不论编者或作者从哪个角度叙述问题，都难以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加拿大的“对美关系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中加关系正常发展一再受挫”。

中加关系 20 年相互隔绝确实是一大憾事，对此，中加两国学者都应当进行认真研究。70 年代末期以来，国际关系已经大大缓和，到 80 年代东西方对立的世界格局已经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应当冷静地回顾与思考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包括中加关系。而且，我们的研究也应着眼于总结历史教训，用来指导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不应当纠缠于决策者的责任或政策思考得失多少上。

若从这个认识出发，笔者认为，应当把中加相互隔绝的问题放到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特定时代加以考察与反思。如果一定要检讨责任的话，首先应当归咎于冷战这一历史错误。从 4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末期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冷战的高峰时期。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世界分裂成分别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公开对立。在当时那种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种种历史条件，在成立之后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人力的资源和潜力的潜力，中国从西方转向东方阵营使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与西方的转变。美国战略家认为，这是对西方力量的沉重打击，引起他们的震惊和仇恨，也必然会使美国统治者要从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处理对新中国的承认与建交问题，决定只要中国大陆是“红色的”，就不予承认。美国决策者当时不仅自己从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的对立的角